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布 哈 林 言 论

（供批判用）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布 哈 林 言 论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布哈林言论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73,000字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38 定价 1.10元

内部发行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说 明

为了适应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我们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编选了这部丛书，按人或按专题分册出版，每册书都有编者加的前言、按语，并根据需要附有年表或其他参考资料。

材料的选择和编译，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布哈林是钻进联共(布)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于 1888 年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小学教员家里，他的父亲后来当过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督察员。布哈林于 1906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接着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同时在莫斯科工人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后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曾几度被捕。1911 年从流放地逃往欧洲，在维也纳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先后侨居瑞士和美国。布哈林在流亡国外期间曾为党的《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在纽约主编过俄文报纸《新世界》。

布哈林于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回国，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起任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1929 年，布哈林因组织右倾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而被开除出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主席团；1937 年被清除出党；1938 年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的一生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生，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扮演可耻的反对派角色。列宁对布哈林的错误曾不断进行批评和斗争，指出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一再指出，布哈林“政治上极不

坚定”^①，“‘总是在老地方’失足”^②。二十年代初，列宁又尖锐地指出，在布哈林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③。但是布哈林一直执迷不悟。列宁逝世后，他的机会主义变本加厉地恶性发展，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

1914年7月底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在战争和革命的严重考验面前，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滚进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1915年春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上述策略，并明确指出，党所号召的国内战争在俄国就是实现民主革命。

当时，布哈林正侨居瑞士，他和一起住在瑞士鲍日的罗兹米罗维奇、克雷连柯以及后来到达的皮达可夫等人结成“鲍日反党集团”，在伯尔尼代表会议和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和策略。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对民主的否定，能够同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只有”社会主义，“出路”就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布哈林一伙坚持“为和平而斗争”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

② 同上，第277、28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的口号,反对把“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当作行动纲领,同时竭力反对民族自决权,攻击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口号是“空想的”和“有害的”,等于变相的“保卫祖国”^①。

布哈林一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妄图跳越民主革命,直接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就是用叫喊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来否定推翻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反对党的最低纲领,取消革命。

列宁把布哈林集团的这些主张比作 1894—1902 年的俄国经济主义,称之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当时迫切的任务,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国家的态度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或者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个问题被考茨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歪曲得混乱不堪。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人中间也有布哈林。列宁指出:“战争使他沾染了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③。正是在大战期间,布哈林鼓吹“炸毁”国家,不要任何国家的半无政府主义谬论。1916 年底,他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中提出反对“国家观念”,宣称社会民主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④。

布哈林完全混淆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主要差别。列宁曾专门撰文批判布哈林的这一错

① 见本书第 5—6 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8—1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00 页。

④ 见本书第 15 页。

误,指出“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国家,把它‘炸毁’”^①。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所持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列宁的批评,布哈林一直耿耿于怀。1925年,即列宁逝世后刚过了一年,布哈林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自己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翻案,公然声称在那次争论中正确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斯大林后来在批判布哈林的错误时指出,回顾1916年在国家问题上的这场斗争,对于揭露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是很重要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态度正是“认为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因而也敌视过渡时期的国家,敌视工人阶级的国家”^②。

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理,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号召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7月底,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发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准备武装起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向高喊“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哈林,在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却跳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断言,农民怀有护国主义情绪,他们已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决不会跟着工人阶级走。他认为农民一旦获得土地,就会心满意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5—16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2、64页。

足而离开革命，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指靠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出路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①。布哈林宣扬的正是托洛茨基的否定俄国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谬论。

对农民应当作阶级分析。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批驳布哈林的谬论时指出，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只是上层富裕农民，而下层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他们一定会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并支持工人阶级争取革命的胜利。斯大林还驳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伙依赖西欧革命的机会主义论调，他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②。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与德国仍处在交战状态。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退出战争，签订和约。虽然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媾和条件十分苛刻，但是鉴于当时旧俄的军队正在瓦解，建立红军的工作刚刚开始，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疲惫不堪，列宁坚决主张接受德方条件，签订和约，以换得喘息时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布哈林组织了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勾结在一起，以“革命空谈”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宣称，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是向国际资产阶级全线投降。他们顽固地否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仍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欧革命上，宣称“俄国革命或者是为国际革命所拯救，或者是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③。在他们看来，促进所谓“世界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苏维埃政权去冒险，进行反对德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布哈林一伙甚至荒谬地叫嚣：“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

① 见本书第2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

③ 见本书第28页。

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①。在布哈林、托洛茨基一伙的煽动下，党内所谓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妥协”、“投降”的论调甚嚣尘上。

列宁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同布哈林、托洛茨基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没有军队，又拒绝签订最屈辱的和约，那就是冒险，苏维埃政权必须赢得喘息时机来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去孤注一掷。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继续对德作战，正是资产阶级目前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布哈林一伙是德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帮凶，他们空谈革命，实际上却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并且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发展。列宁强调指出：“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②

在列宁的坚持斗争下，终于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但是条件比原先的苛刻得多了。列宁就此指出，布哈林之流对苏维埃共和国是“有罪的”^③。

历史证明，列宁当时采取的革命的妥协是完全正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谈到俄共（布）的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④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喘息时机来整顿经济，组织红军，为后来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准备了必要条件。

1920年底，苏维埃国家经过三年国内战争，终于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开始过渡到和平的经济建设，着手恢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49页。

④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9年版第196页。

复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

这时候,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他提出“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要求在工会中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等等。托洛茨基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从而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争论中,布哈林充当了托洛茨基的帮凶。他纠集了一个所谓“缓冲”集团,对各派观点加以调和折衷,以“缓冲”为名,行反党之实。布哈林宣扬工会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①。他为托洛茨基攻击列宁单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谬论打掩护,宣扬应当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

列宁在同布哈林的斗争中着重批判了他的折衷主义谬论,指出他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②。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个学校”^③。列宁深刻地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④。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不偏不倚的“缓冲”和“中庸”立场的。布哈林高唱“缓冲”,貌似公允,实则托洛茨基的反党派别活动火上加油,因此列宁形象地称之为“缓冲煤油”^⑤。过后不久,布哈林便公开和托洛茨基共同签署了一个主张工会国家

① 见本书第8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1页。

③ 同上,第455页。

④ 同上,第441页。

⑤ 同上,第420页。

化的纲领,从而彻底撕下了“缓冲”的假面具,完全站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去了。列宁愤怒地斥责布哈林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他的“缓冲”集团“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①。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布哈林之流在工会问题上的各种谬论,斥责了形形色色的反党派别集团。

二

工会问题的争论结束后,布哈林并没有从列宁对他的批判中吸取教训,相反地,他的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了。

布哈林为了给自己的机会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于1921年底抛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肆意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在书中鼓吹“平衡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②,“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③。布哈林却把平衡绝对化,把力学上的平衡规律机械地搬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上来,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处于平衡状态,平衡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而运动、发展则是暂时的状态。

布哈林从平衡论出发,认为运动的泉源是外部对立力量的斗争,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把这种理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28、418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9年版第301页。

论用于社会，认为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所谓体系(即社会)和环境(即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布哈林避而不提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个根本问题，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生产关系说成是“人们(被视为‘活机器’的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劳动配合”^①，从而认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平衡”的基础上。他宣称社会的各个不同部分“总是互相适应的，所以它们能够同时存在”，这就是所谓“平衡”^②。正因为这样，在布哈林看来，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阶级合作”的工具，是维系“阶级社会中的平衡”，“维系各个阶级，不使社会崩溃、瓦解以致彻底分裂的箍子”。这样，在他看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造成了新的平衡”^③。

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④。布哈林宣扬的正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根本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平衡论”是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在保持“平衡”的借口下主张维护现状，反对变革，反对革命，是一种鼓吹倒退复辟的理论。正是根据这一理论，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布哈林在一系列文章和言论中喋喋不休地强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和阶级矛盾就开始消失，社会不再需要革命而走上“进化的道路”，即所谓“真正长入社会主义”。他宣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

① 见本书第 133 页。

② 见本书第 97 页。

③ 见本书第 120、123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65 页。

线”。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各阶级的关系是和平共处、阶级合作的关系;他说,在过渡时期“统一因素越来越压倒对立因素”,应该强调的不是阶级对立,而是“统一”^①。因此,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布哈林就大谈“国内和平”,说什么“资产阶级顺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达到了各阶级和准阶级的新平衡”^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要求对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要贫农和富农相互“帮助”,大家“发财”,他宣扬说,这样做,到时候富农的孙子还会为此“向我们道谢”^③。

布哈林煞费苦心地描绘了一幅资本家和富农“和平长入”的图景:在城市,让资产阶级(耐普曼)开店铺做生意,而无产阶级则在它旁边开店铺,但卖的货物比它好,价格比它便宜,通过这种方式排挤它。这样,资产阶级就会老老实实在地关闭铺子,自动交出阵地,服从苏维埃政权,因为资产阶级认识到“一切反对新制度的积极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尝试都是完全徒劳的”,所以“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满足于实际状况”^④。在农村,富农合作社同贫农合作社、集体农庄并行发展,富农把剥削来的款子存入国家银行,从而使自己同苏维埃经济机关联结起来,被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而国家则把富农的存款以信贷的形式用来支援贫农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这样,富农合作社的窝巢就会“长入社会主义体系”,因为它们“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⑤。

在布哈林看来,某些时候阶级斗争之所以尖锐化,并不是社会

① 见本书第 241—242 页。

② 见本书第 143—144 页。

③ 见本书第 181 页。

④ 见本书第 213 页。

⑤ 见本书第 210 页。

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由于阶级敌人必然要作垂死挣扎的结果，而是由于下层苏维埃机关“软弱无力”造成的，随着这些机关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①。

这样，布哈林就用“和平长入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他认为马克思和列宁把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看作仅仅是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这是因为他们受历史的限制，未能预见到苏联的现实。布哈林宣称：“如果不存在外部帝国主义力量，那末在公开的阶级冲突中被推翻、被击败的本国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的阶级瓦解过程就会快一些，与此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专门镇压机关，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剩下的任务，就只是进行“和平的组织工作”了。

布哈林的上述论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首先是因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要作拚死的反抗，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正如列宁深刻地指出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③。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

① 见本书第214页。

② 布哈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攻》（文集），莫斯科1924年俄文版第10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40页。

和更残酷”^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列宁指出：“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②，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③。正是千百万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④。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小商品生产者，特别是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用社会主义的集体大生产逐步取代小商品的个体生产。布哈林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重要任务。1919年在讨论俄共(布)党纲时，他反对在党纲里写上论述简单商品生产的条文，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旧的简单商品形式的形成决不会还成为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农民商品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产生和兴起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循环的起点”。他断言“旧资本主义形式的瓦解，必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组织的新形式”^⑤。因此他竭力反对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搞农业集体化，说小农经济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长入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一样。

斯大林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自流论”。在资本主义下农村会自发地跟着城市走，是因为它们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但是建立在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是绝对不可能自发地长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必须对农民不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6—297页。

② 同上，第200页。

③ 同上，第181页。

④ 同上，第201页。

⑤ 见本书第50页。

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把他们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大生产上来。布哈林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妄图保存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生产,培植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的土壤。

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布哈林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一样,也乞灵于“物质刺激”这个法宝。1925年以后,正当城乡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向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布哈林提出“发财吧”的口号,号召农村的“所有阶层”努力发财致富^①,让资本家和富农放手剥削;他以“发挥私有小生产者的经营兴趣,刺激生产的扩大”为理由,要求开放自由周转;他以所谓“基本农民群众失去生产的任何刺激”为借口,反对建立集体农庄。布哈林污蔑广大工人前进的动力“不是共产主义思想,而是私人利益”,竭力鼓吹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内部发挥“个人主义的刺激因素”,扬言要用物质刺激“这把钥匙”来打开工人阶级的个人利益之门,使之促进经济的发展。布哈林总结说:要使“大家这样工作:让无产者以自己的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去促进整个生产的高涨”^②。这完全是妄图以“物质刺激”为诱饵,欺骗广大群众跟着布哈林一伙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苏联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历史充分证明,物质刺激“这把钥匙”只能打开复辟资本主义之门,决不可能真正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1918年列宁在批判布哈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时曾尖锐地指出:“布哈林观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领域的任务,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③。

① 见本书第184页。

② 见本书第17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57、558页。